



万学仁先生序： 反右运动前后

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还是大二的学生。学校党委号召全校师生帮助党整风，多提意见。青年学生都听党的话，积极响应，由各班党小组和共青团支部组织开会，听取大家对党的意见。学生中的发言多数是有关教学、生活管理等问题。但也有人提到国家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

- 1、认为镇反、土改、三反、肃反过火了，有冤假错案。
- 2、认为胡风属于文艺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反革命，而且没有经过法院审判。该生的发言，在《校报》和《省报》全文刊登。
- 3、认为农村中征购指标过高，农民中有饿饭的现象。

在老师中，学校也举行了座谈会，老师们提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并把他们某些人的发言刊登在《校报》上，有的还登在省级报刊上。

鸣放到了一定阶段，从1957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社论和报道：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

6月9日报道了《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座谈，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同日发表了《上海四十四位老工人在座谈会上慷慨陈词 今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 希望那些认识不清的人睁开眼睛看清楚》。同日发表了中国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的文章《让‘鸣’‘放’向健康方向发展》；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的文章《怎样帮助党整风》；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的谈话《应该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民盟副主席史良10日晚在民盟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揭露了章伯钧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中国民盟中央常委、北京支部主任委员吴晗把反击火力指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三个右派。

这样，“反右派运动”最初在民主人士中展开：左派民主人士批判右派民主人士，对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

6月19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公开发表。这一文献，顿时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重要文献，成为反击右派运动的理论武器。

6月2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不寻常的春天》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里定下了“反右派”的重点是“章罗同盟”。

反右运动在北京轰轰烈烈地开展，揭发批斗右派分子的罪行，全国各地也立即开展。我们学校对师生中的右派进行批斗，对极右分子按院系开大会批斗，揭发他们的罪行。学生中，凡是涉及到对中央政策提出批评的人，基本上都定为了右派。

通过反右运动，我们班上划了6个右派，占全班50人中的12%；另外还有两人在鸣放中发表了意见，虽未定成右派，在共青团内进行批判，受到团内记警告的处分。

运动后期由于全校右派人数比例不够，又在1958年进校的新生（大一）中选了一些右派。

全国各专区（州）和县，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间比中央和省级单位以及各高校要晚一些。当时，有一个专区在反右运动中，组织了整风反右的五人领导小组，其成员有地委书记、专员、地委的部长等和一位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专员等人虽是领导小组成员，但主要精力放在党委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上，只是定时听听汇报，发表些意见，很少处理具体事务。遇到重大问题时领导们才参加讨论，具体负责的是这位县委书记及一些工作人员。这位县委书记是专门抽调的离职干部，五人小组办公室的工作由他办理安排。此人工作能力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立过赫赫战功，深受群众拥护。该专区的安排是将全地区各县级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教师集中在一起学习，分组进行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他们开了几次座谈会，没有人发言。人们在报上看到了北京和省会城市反右的报道，心有顾虑。尽管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地委书记）表了态，不抓辫子，不打击报复，不搞秋后算账，但发言者寥寥无几，而且谈的内容也是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如怎样安排加强学习、怎样增建菜市场等。

五人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如何才能打开这种冷清的局面。五人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由一位领导干部带头鸣放，便于引蛇出洞。并推选这位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发言。这一措施效果好，发言的人踊跃上台提意见，这样划右派的对象也就有了。到了运动后期，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说，一是右派的比例不够，二是上级要求要划一个县级干部的右派。于是右派的帽子就戴在这位县委书记头上。大会批判时他不服，不肯低头认“罪”，他认为：他带头发言是组织决定的，而且谈的内容有分寸，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几条标准，他没有反对党的领导 and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时既然把右派分子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进行

批斗，谁还敢为他辩护呢？打成右派后他多次向上级写申诉，要求平反。由于他不肯低头认罪，顽固不化，从严处理，判了他3年劳教。在服刑中他偷偷逃出监狱，上北京申诉，在途中被抓，将劳教改判为劳改。直到1979年才给他平反。

至于比例不够的问题，就由各级领导选定。其中有两人是国民党军队中的起义军官，平时谨言慎行，鸣放时没发表任何意见，仍被划成右派。划的依据是：“右派右派，客观存在，发言不发言都是右派。”

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意见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成为历史上的悲剧。1962年尽管有的人揭了右派的帽子，但巨大的创伤却是难以弥补。而发生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分子开始，而右派分子又是批斗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成了第二次反右运动。右派们在文革中无一不吃二遍苦，雪上加霜！这二遍苦比1957年更苦：批斗，抄家，蹲牛棚，进劳改队，扫地出门回原籍……

在所划的右派分子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都是错划的。在这些右派分子当中，他们爱党、爱国，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党的干部。如：

沙文汉，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杨思一，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彭瑞林，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院长。潘福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南省政协主席。欧百川，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李世农，安徽省副省长，中共安徽第一任组织部长。陈沂，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1948年先后担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政委……

2、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如：

龙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九三学社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黄琪翔，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费孝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

另外，因为“章罗联盟”还涉及到89名骨干分子。

3、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如：

文学界：

丁玲（女），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1952年她的作品《太阳照耀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学奖。冯雪峰，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艾青，

诗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白桦，作家，中共党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吴祖光，剧作家，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曾彦修，杂文家，中共党员，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傅雷，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书记处书记……

新闻界：

徐铸成，《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主任。戈扬（女），《新观察》杂志主编，中共党员。陆怡，《新闻报》副总编辑。陈模，《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中共党员。彭子冈（女），《旅行家》杂志主编，《文汇报》编委，中共党员。蒲熙修（女），《文汇报》副总编辑，《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

艺术界：

钟店裴，电影评论家，《文艺报》艺术部主任；1937年，18岁的他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共。项坤，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南征北战》、《烈火中永生》等影片中饰演角色，主演《佩剑将军》。吴茵（女），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和麻雀》成功地演饰了各种老太婆角色，从此有了“东方老太婆”的美称。沙蒙，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委员，1945年加入中共，导演，导演的影片有《赵一曼》、《上饶集中营》，与林彬合作编导《上甘岭》等……

江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委员。丁聪，漫画家，《人民画报》副主编；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装饰》杂志主编等；主要作品有《阿Q正传插图》、《四世同堂插图》等，出版有《丁聪漫画选》。庞薰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著有《薰琹随笔》；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态度严谨，独具风格，曾深入贵州80多个苗寨，考察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感人魅力；其代表作有《地之子》、《路》、《贵州山民图卷》、《瓶花》等。刘海粟，杰出画家，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江苏文联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英国剑桥国际传略中心授予“杰出成就奖”，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欧洲棕榈金奖”；曾任第一届江苏省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刘雪庵，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曾以一曲《何日君再来》闻名。张权（女），女高音歌唱家，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员，曾主演《茶花女》……

教育界：

张奚若，政治学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为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林汉

达，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字委员会委员、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1949年作为民进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等。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黄药眠，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其实，他是1928年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并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王造时，法学家，“七君子”之一，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伟长，力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曾昭伦，化学家，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年轻知识分子；

王蒙，青年作家（23岁）1948年加入中共，1956年，他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记着（32岁），1944年加入中共，《中国青年报》编委；1956年发表了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引起注意。刘绍棠，青年作家（21岁），1953年加入中共，1956年在《中国青年报》社从事专业创作。流沙河，青年诗人（26岁），成都《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初，以散文诗《草木篇》引起注意。邵燕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24岁），1953年加入中共。宗璞（女），《文艺报》编辑（29岁），1953年加入中共……

全国各大学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以及中小学的年轻教师……

以上的各类成员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过着穷困艰苦的生活，失去了宝贵的时光，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浪费了这些宝贵的人才。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挑起了平反重担。平反冤假错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解决“文革”和“四清”冤假错案的同时，胡耀邦也着手解决“右派”摘帽和平反问题。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向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即55号文件。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中央采纳了此建议，先全部摘帽，再平反，分两阶段进行。

因为“摘帽”是一种概念，“平反”是另一概念，要加以区别。所谓“摘帽”，即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不管你原本是“右派分子”也罢，错划也罢，反正“摘帽”就是了。“平反”则不同，那就是说，原本不是“右派分子”，错划了。

不过，对于错划了的右派分子，即不像其他冤假错案那样用“平反”一词，而采用“改正”一词。

1978年6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了各项政策，并呈报中央。

- 1、凡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 2、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给予必要的补助。
- 3、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被开除党籍的要恢复党籍。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实施方案》，并指出：

“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对于过去错划的人，尽管时隔多年，也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1980年，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基本结束。经过这样的摘帽、改正，全国的右派分子总数有了精确的统计，即552877人。当然，这仅仅是指正宗的“右派分子”，还不包括“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如果把这些“分子”和受牵连的家属们计算在内，那就达数百万之众。

经过1980年的认真核查，最后的统计显示，改正的“右派分子”为54万多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99%以上。全国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需进一步甄别的，不到五千人。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的请示报告》，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报告了关于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复查情况。

予以改正的为22名：章乃器、陈铭枢、黄绍竑、龙云、曾昭伦、吴景超、蒲熙修、刘王立明、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

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五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文炳。

第二部分，对“章罗同盟”一案予以否定。报告说，当时章伯钧与罗隆基并不存在联盟，但有呼应。

第三部分，是关于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以统一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问题。

1981年6月21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决议形式对“反右运动”作了正式的结论：

“这一年（指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后果。”

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政策实施后，全国人民一致拥护，真正做到了“实事

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改正后的右派分子及他们的家属欢欣鼓舞。虽然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耽误了他们为社会做贡献的宝贵时光以及家属受到牵连，但落实政策后在各条战线上，他们积极地工作，创造了不少的奇迹，把剩余的光和热全部奉献给祖国。这说明党的英明和政策的正确。

武宜三先生为了编写《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CD版，他整天坐在电脑前，收集右派分子经历，整理密密麻麻的反右运动的资料：查阅书籍、报刊以及右派分子们写的材料，其中也得到了一些学者、专家以及右派分子本人及其家属关心和帮助。武先生花了十年的功夫，在劳改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终于完成了并即将出版的这部《大辞典》，我热烈祝贺他的成功。尽管它所收条目离实际数目还非常遥远，但毕竟收集了四万多人的资料，让很多1957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和他们的后人，能看到1957年、1958年反右运动的过程。武宜三先生的劳动没有白花，这部《大辞典》具有历史意义，是一部珍贵的文献。

武先生要求我为该《大辞典》写一篇序，本人才疏学浅，愧不敢当，实不堪其重荷。但看到武先生在编写《大词典》中，孜孜不倦、不辞辛苦、忘我劳动的精神；看到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们，他们尽管受了委屈，而他们爱党、爱国和为祖国做贡献的精神始终如一；基于以上两点，我只好写一篇拙作表达我对武宜三先生的敬佩；表达我对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们对祖国做贡献的精神的点赞。

2019年9月24日

〔万学仁，内江师范学院教授，前志愿军战士、到过朝鲜；著作有《人民公社头几年》（与人合作）、《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世界》等。〕